

金融强国理念的中华文脉与创新发展的^{*}

裴长洪

〔摘 要〕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和认识货币的民族,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形成了古代灿烂的金融思想,它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创新实践的历史文脉。古代思想家主要讨论了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货币的职能与运动规律、借贷与信用关系以及货币拜物教及其批判。这些认识比西方早了几百甚至上千年。进入近代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中国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金融思想也发生了移植性变化,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及其理论,使中华文化保持了独立和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实践,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探索,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强国目标创造了重要前提和条件。

关键词:金融强国 “两个结合” 文化传承发展

JEL 分类号:B11 B24 N25

2023 年 10 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创新的必然。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和认识货币的民族,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形成了古代灿烂的金融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一席。到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现代金融活动和理论也在中国传播,逐渐完成了传统金融活动向现代金融的转型。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代金融实际上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买办势力控制的。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实践开创了中华民族金融历史的新纪元,她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并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之路,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支撑。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两个结合”的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我国早在殷商时期就以贝为货币,以“朋”为计算单位。《诗经·小雅》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之句,就是以贝壳赠与的意思^①。周朝已经出现金属货币,到春秋战国时期已通行各种形状的铸币,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是世界货币文化最早形成的国家。在春秋战国以前,“货”与“币”是不同的概念,货指珠玉,币指皮币。战国时代,布帛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货”与“币”的区别就逐渐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当代经济学与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传承创新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3YZD058)。

^① 《诗·小雅》,朱熹,《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33 页。

模糊了。到《管子》成书时代,就有了“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的说法^①。《后汉书·公孙述列传》中有“述废铜钱,置铁钱,货币不行,百姓苦之”的记载^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说“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③,货币二字已经连在一起了。但历经弥久,这个概念并不流行,唐代及其以后的《食货志》和《通考》等书,用的都是“钱币”二字。有的则用“货泉”“钞币”“钱钞”等名词。直到清末,中国开始设立银行和改革币制时,“货币”一词始在社会流传使用。而“金融”一词则出现更晚,1920年北洋政府发行“整理金融公债”,以解决中国、交通两行的停兑风潮,“金融”一词才与银行业务相结合,形成与财政相区别的独立概念。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不应局限于只以“货币”名称标识的对象,而要依据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从各种名称的实际意义和性质中认识它的金融含义。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主要内容如下。

(一)货币与财富的关系

在西周之前,虽然已经出现金属货币,但物质财富的表现形态仍然是多样的,金属货币只是其中之一,尽管周武王灭商后,“散鹿台之钱”,但自然形态和使用价值仍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即“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日,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④因此,大多数思想家都只是把货币看作是一种符号。但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单旗却独具眼光,他似乎认识到货币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态”,而不是西方古代人们所非难的那样,是“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破坏者”^⑤,针对有人提出废除现有流通的货币,而改铸新币的主张,他反对的依据是,那就会使人民丧失其资财,即“民失其资”^⑥。可见,单旗已经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一般形态。

对于财富的本质,古代墨家有卓越的见解。关于商品的价值概念的探讨,在墨子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中都有记载。在《经说下》中,有“为屨以买,不为屨”^⑦,就是说鞋子被人购买,那么对于做鞋子的人来说,他是不准备使用它的。无独有偶,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也发现每一种物品都包含两个用途,一个是它所固有的,可以为人所用,例如鞋可以用来穿,另一个用途是可以用来交换^⑧。这种关于价值概念的天才闪耀,中国墨家也有,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极高评价,用于中国墨家也当之无愧。《管子》关于财富的思想,虽然也强调以实物形态的土地畜牧产品为主,但已经注意到货币财富的重要性:“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余,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余”^⑨。西汉晁错探讨货币为什么会成为财富,“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⑩他把货币的价值说成是王权赋予的,这种货币名目主义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是常见的,这与西方古罗马时代相似,古罗马法曾申明,王权可以任意规定货币流通的价格^⑪。司马迁把财富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分别指农产品、工商业利益和不义之财。这说明在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货币财富居于“末富”地位是社会共识。南北朝时期南齐的孔觐批判了货币名目主义:“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于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

① 《管子》,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9页。

② 范曄:《后汉书·公孙述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37页。

③ 范曄:《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页。

④ 《礼记·曲礼》,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0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152页。

⑥ 《国语·齐语(下)》三,徐元浩,《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页。

⑦ 《墨子·经说(下)》,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57页。

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⑨ 《管子·山权数》,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17页。

⑩ 班固:《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1页。

⑪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①此时,孔觐已经认识到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北宋的周行己也发现了货币与商品之间的等一性,至于这个均等关系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那就不能苛求于古人了。

南宋的货币思想有标志性变化。因为南宋是铜钱、铁钱和纸币并行流通的时代,纸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流通,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尽管探讨纸币的言论很多,但理论成果却乏善可陈。多数思想家都把用于分析金属货币的传统观点延伸到对纸币的分析上,一直在货币材料的使用价值这个“死结”上兜圈子。元朝建立后,货币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用白银替代铜钱作为价值尺度,同时发行不兑换纸币。公元1287年元朝正式发行不兑换纸币,这要归功于货币学家叶李,他为元统治者制订了“钞币条画”,即世界上第一个不兑换纸币条例。虽然他有杰出的货币发行管理贡献,但在货币财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依然没有理论突破。

(二)货币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铸币规定,即便在一个诸侯国内,也往往允许多方自由铸造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统一币制,货币定为黄金和铜钱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二十两为一镒),铜钱为下币,以铢两(十四铢为一两)为单位。秦钱重半两,所以号称“秦半两”。珠玉龟贝等仅作饰物不当货币行使^②。国家统一铸币,开创了中国古代货币史的新纪元。汉高祖立国时,战后经济凋敝,由于秦半两太重,物价腾贵,刘邦便允许民间铸造三铢的轻币。然而,各刘姓诸侯私铸盛行,富过天子,成为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而且导致钱质劣,重量日轻,物价大涨。后来汉武帝下令禁止私铸,并于公元前118年铸造“五铢钱”,将以往各郡国所铸造的钱一概废销,统一由中央政府机构(上林三官)铸造和发行。王莽篡汉后,搞的币值改革闹剧是以小钱换大钱,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通过发行货币残酷剥削人民。魏晋时期仍用五铢钱,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铸造“四铢钱”,结束了两晋以来不铸钱的历史。隋朝后期杨广和各藩王又复私铸,币制大乱,币值大贬,可见中国历代王朝币制的严重问题是私铸。南宋时,民间出现纸币“交子”,但民间经营失败,到1023年(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设立纸币管理机构“交子务”,至此中国纸币走向官方发行。官方发行货币的通病是滥发,最典型的是元朝,元朝中央政府垄断收藏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而且也不允许铜钱流通,只允许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在市面流通,作为货物交易的支付手段。纸币发行数量也经常因为统治者的挥霍而超发,而元朝在历经多次通货膨胀后走向灭亡。

鉴于私铸导致政治和民生问题的严重性,货币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观点是主张国家控制货币铸造和发行。《管子》的思想体系是把货币作为控制国家经济的重要工具,即要追随“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③。而且要求国家要保持黄金与铜币的兑换率^④,避免两种本位币交换比率的波动而影响商品价格。汉武帝时的贾谊反对私铸非常坚决,强调私人铸造不仅导致币制混乱,而且妨碍农业生产,“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⑤,并认为仅仅靠法律禁止还不够,还需要由官府垄断铜币的材料,才能达到有效禁止私铸的目的。桑弘羊也坚决主张币制统一于国家,反对郡国和私人铸造,说:“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⑥。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王朝的沈庆之又主张任民私铸,但官收百分之三十铸造税,显然这是为王朝解决财政问题的主张,但事实上不可行。北朝的北魏也曾放任私铸,但为了稳定通货,政府采取抛售藏绢以回收通货,这大概

① 萧子显:《南齐书·刘峻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52页。

② 班固:《汉书·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2页。

③ 《管子·山国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9页。

④ 《管子·轻重甲》,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3页。

⑤ 班固:《汉书·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5页。

⑥ 桑弘羊:《盐铁论校注·错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7页。

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的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来稳定币值的记录。但南齐孔觐反对私铸,说:“铸钱之弊,在轻重累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①。因此他建议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来稳定币值。随后的五代十国和唐宋各朝,都有私铸问题,但主要的问题是官钱数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经常形成通货短缺和钱重物轻的现象。沈括针对南宋的“钱荒”,仍然认为不应该开铜禁,因为铜禁一开,就会有很多人销钱为器沉淀下来,必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所以,解决钱荒要从其他方面入手,不能用开放私人铸造这一途径。

北宋随着工商业发展而铜钱匮乏,但白银产量增加,因此为白银流通创造了条件,与北宋同时期的辽和金国也广泛使用白银,从而缓解了铜钱不足。另外,北宋真宗年间出现纸币,由十六家富户印制,称之为“交子”,后来私家产业衰败,信用动摇,于宋仁宗年间(1023年)改为官家印制发行,称为“官交子”,而且禁止私人印制^②。由此开始,货币与国家关系的矛盾就从谁来铸造金属货币逐渐转向国家如何正确把握纸币的发行数量。而货币思想也逐渐围绕这个矛盾展开讨论。元朝初期,统一印制的纸币在全国流通,并禁用铜钱,其购买力一开始还是稳定的。但好景不长,发行纸币被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加上水旱灾害,导致物价腾贵,纸币贬值。为了防止国家滥发纸币,在南宋时就出现了管理发行纸币的“称提之术”,但古代文献中查找不到为何人所创,何人对其有明确论述。但它的具体措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货币思想。首先是规定发行最高限额。尽管统治者并不遵守,但从理论上它值得肯定。其次是要有发行准备金。但也难以在实践中推行,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第三是分解发行,以三年为一界,到期以新换旧。这意味着对发行情况的定期检查,特别是由地方政府发行钞币时,就更有必要了。第四是对钞币贬值的补救措施。例如临时储备现金,回收纸币以稳定纸币,也包括由政府出售有价证券,如盐、茶、香、矾等专卖凭证以及度牒、官诰等有价证券,从流通中回笼纸币。这些都是近代社会发行纸币的原则以及货币市场上常见的现象。只是抛售的商品或证券不同而已,因此“称提”可以算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兑换纸币理论。

清代的咸丰年间,出了一个引起马克思注意的中国货币思想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个注释中援引了他的故事^③。当时,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军费开支巨大,财政紧张,为此发行纸币以补充军费。而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坚持官票(银)与官钞(钱)应酌量兑现,受到咸丰皇帝怒斥,说他不识大体,只顾维护商人利益。不识大体说的是他不替朝廷之急考虑;只顾及商人利益,说的是他主张发行可兑换纸币的兑现要求。王茂荫根据历代发钞经验总结出五条原则:(1)纸币必须是可兑换的;(2)不能用来作为搜刮民财的工具;(3)必须有发行最高限额并不能经常变动;(4)用纸和印刷须精致耐久;(5)钞币不能由官府直接发行,因为人民不愿意同官府接触,主要需要靠商家协助^④。他的总结是正确的。在没有外来思想影响下,能够总结出这样的思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其设计也的确是中国兑换纸币的最早模式。1909年清朝末期颁布的“兑换纸币暂行章程”^⑤,移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券发行的办法,但也可以看作是王茂荫货币思想的延续发展。

(三)货币的经济职能和运动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分析货币的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职能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春秋时代的单旗提出的关于金属货币的轻重和子母相权论,通过货币购买力和物价水平的比较,所谓“以母权子而行”^⑥的含

① 萧子显:《南齐书·刘峻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52页。

② 脱脱:《宋史·食货志·会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3页。

③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注83。

④ 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一)·条议钞法折》,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7页。

⑤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四)·钱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741-7753页。

⑥ 《国语·齐语(下)三》,徐元浩,《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5页。

义已经有了关于货币价值尺度认识的因素。这是我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它的缺陷是明显的,即仅仅限于对流通过程的观察,而且把变动标准货币单位看作是调整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出现失调的唯一办法。《管子》的轻重理论运用到所有商品价格和货币,其中说:“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①。就是说,粮食价格和布帛价格都可以通过货币流通来调节它的供求关系,货币集中在国家手中,市场物价就贵,货币释放民间,市场物价就降。由此看出《管子》作者管仲已认识到货币是一种流通手段。所谓“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这是对货币流通职能的认识。掌握货币和谷物是人君准衡天下之器,国家通过货币投放以制约谷物轻重,同时也制约货币本身的轻重。这种均衡状态不是自发的,而是国家掌控的结果。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管仲也认识到它有支付手段的职能。提到有几种报酬是以货币支付,并以货币进行借贷与偿还^②,部分租税和利息以货币交付等等。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管子》提到过万乘、千乘、百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千金、百金之蓄余的观点;在生产过程中的公共准备金是货币贮藏职能的一种形式,《管子》把它称为“环乘之币”,由它来适应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需要。《管子》还多次提及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③,这当然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的铜币各不相同,各国之间交易须以黄金为支付手段。

关于货币的运动规律,《管子》从货币数量变动直接引起商品价格变动的实际情况中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这比17世纪西欧的货币数量说早了两千多年。它指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④。这里的“轻”与“重”说的是一般商品价格的贵贱,国家如果掌握流通中货币的90%,市面上的货币只剩10%,那市场物价就会大跌,这时国家就应收购商品,放出货币,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了,市场物价也就上涨了,甚至涨到十倍。不仅市场供求,也包括市场物价都与货币流通的数量有关。即使是“环乘之币”的投放数量也有调节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功能,因此设立这种储备金要因地制宜,要考虑不同地区“人若干,田若干……谷重若干,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以及“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⑤等因素。当时多数的诸侯国都很小,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都不可能很大,因此其必要的货币数量确实有可能依据《管子》所设计的各种条件来确定。以货币数量来调节商品价格,是国家掌控经济的一种手段,在今天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管子》的分析中,商品价格的变动不是依据供求关系决定,而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在一个不大而经济单一、又相当程度上封闭的国家,这样的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

价格变动是货币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管子》把轻重理论运用到价格的分析中,形成了独特的价格变化认识。《管子》把现代经济学的均衡运动称为“衡”,指出“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而且,“衡”也“不可调”,犹如岁有四时之分,“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⑥。就是说,绝对稳定的物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存在波动,也就没有均衡运动,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一高一下”是市场价格的客观规律,价格政策既可以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上来调节经济活动,还可以运用国家掌控货币与谷物的条件把商人的投机暴利于收归国家。国家收入可以不完全取自租税,“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利归于君

① 《管子·国蓄》,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5页。

② 《管子·山至数》,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22页。

《管子·山国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84页。

③ 《管子·轻重乙》,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1页。

《管子·轻重戊》,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26页。

④ 《管子·山国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87页。

⑤ 《管子·山国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84页。

⑥ 《管子·轻重乙》,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7页。

也”^①。《管子》还运用相对价格原理,以税收方式间接刺激下游产品价格变化,使国家获利。例如,国家掌握大量的布,就对原料麻征税;国家有大量织帛,就对原料丝征税,从而间接刺激布价和织帛价格上涨,使国家资产增殖^②。在国际价格问题上,《管子》主张为了保持本国主要财物不外流,应使国内价格水平与国际水平一致,但在需要吸收外国商品输入时,就应提高进口品价格,即“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③。如果要鼓励出口,本国商品的价格就需要比别国低。采取国际价格的比较,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国际利益,“因天下以制天下”。这套理论比欧洲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先进多了。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另一位对货币运动规律有重要贡献的是北宋的沈括。他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比欧洲的威廉·配第和约翰·洛克早了六百年。针对当时出现的“钱荒”,他提出了建议,除了增加货币的绝对量之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早在晚唐,学者已经注意到货币的窖藏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沈括说:“钱利于流借”。如果十户人家,共有十万元,但只窖藏在一家,那百年之后也只是十万;如果十户人家通过交易流通,每户人家得利十万,那十户人家共得利百万。如此循环下去,“钱不可胜计”^④。同样,约翰·洛克也说过:“同一个先令,有时也许在二十天里起了支付二十个人的作用,有时却一连一百天留在同一个人手中”^⑤。中西对照,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借贷信用问题

古代中国借贷发端很早,“债台高筑”的成语是传说中周赧王为逃债躲到高台的故事。《周礼》中记载有“泉府”的官方机构,职能就是向人民赊贷。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的放债取息的事情更多。如《左传》文公16年记载,宋国饥荒,“公子鲍竭其粟而贷之”^⑥,《晋语》中记载了晋文公“弃债”的故事,《管子》的《轻重丁篇》也有关于借贷粟和钱的记载,战国时期孟尝君靠放债取息来豢养三千食客^⑦。秦统一中国后,借贷进一步普遍,不仅商人、地主放贷,还出现了专门放债牟利的“子钱家”。进入汉代还出现了政府向贫穷农民的贷款,王莽新朝曾“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于民,收息百月三”(即月息百分之三)^⑧。但总的看,两汉信用业务以私人借贷为主,官府与王侯的借贷偶尔发生。南北朝的借贷出现特殊现象,那就是寺院成了代行借贷的专门机构,寺院占有大量田产并广有钱财,为其存放款业务提供了条件。这与西方中世纪教会一样,都是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圣经上“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⑨的戒律成为讽刺。

在经济思想方面,先秦时代没有出现过像古代西欧和其他东方国家那样反对高利贷的思想。到西汉初出现晁错反对迫使农民“卖田宅,鬻子孙”的私人高利贷^⑩,东汉初的桓谭,更是积极要求禁止私人高利贷活动^⑪。但一直未出现反对官府放贷取息的意见。到唐代,高利贷更猖獗,特别是

① 《管子·国蓄》,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2页。

② 《管子·轻重丁》,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1页。

③ 《管子·小问》,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5页。《管子·轻重乙》,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53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929页。

⑤ 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

⑥ 《左传》,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4页。

⑦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0页。

⑧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18页。

⑨ 《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版,第74页。

⑩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2页。

⑪ 范曄:《后汉书·桓谭传·陈时政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8页。

官府高利贷比私人高利贷更残酷。白居易对此特别反对,他认为用高利贷利息收入来补充官府经费,致使“私财竭于倍利,官课积于逋债,至使公食有阙,人力不堪”,他主张废高利贷而征收人头税,以便使万民分摊负担,如此则“贫户无信息之弊”,官府收入更为可靠^①。当然他没有意识到恢复人头税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唐代政府贷款的高利贷常常由于本钱不足而拉拢私人高利贷“捉钱家”来入资参与。结果使私人高利贷也假借官钱名义剥削人民^②。而且私人高利贷还借机侵蚀了官府,遭到强烈反对。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和青苗法都试图以政府借贷方式来取代豪富之家的民间高利贷。市易法规定,百姓向地方政府赊贷财货,可以用田宅金帛来抵押,年息二分,过期不还息,每月罚款2%。青苗法是政府对农民的贷款,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利率二分(期限半年,等于年息四分)。这些措施其实就是针对大地主和商人的高利贷盘剥人民的措施,当然遭到他们代言人的反对,说官府“与民争利”“生事扰民”。可见,王安石希望借助政府的信用措施来缓解当时十分严重的私人高利贷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反对派的声音代表儒家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据主流地位,此后,不仅反对私人贷款取息的呼声日渐消沉,而且为私人贷款取息辩护的声音反而增加。南宋的陈亮认为,将谷物贷于下户“量取其息”符合“交相养”“有无相通”的精神^③。二百年后的明朝初期的丘浚仍然认为私人从事贷款业务是合理正义的,应当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

到了明末,钱庄成为主要信用机关,从事金银钱三者兑换业务,而且也承揽放款业务。清初典当业兴起,1664年即康熙三年,全国大小当铺就有两万多家^④。清朝中期以后逐渐衰落。清代的主流信用机关是钱庄和银号。长江流域和上海称钱庄,其他地区称银号。清政府对这些信用机构采取放任态度,听任自然。而钱庄银号往往贪图发行利益,无限增发,一遇兑现风险,便倒闭而使持票者遭受损失。外国银行势力入侵中国后,它们与外国银行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共同榨取中国人民血汗。外国银行设在大的通商口岸,只对洋行发放贷款,一般不贷款给中国工商业,而钱庄银号可以沟通口岸和內地的经济联系,在进出口贸易中,钱庄银号在洋商华商之间牵线搭桥,为外国资本服务,从中分润其利。从而成为相当程度上的买办资本。但在经济思想史上,对这种信用形式的研究和评论在辛亥革命之前一直很少。

(五)货币拜物教及其批判

货币拜物教是指人们把货币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原始的宗教迷信。它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商品是人们生产并通过交换满足他人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商品本身并无神秘可言。作为独立的商品的生产者,其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性,但作为交换的商品,其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性。作为私人劳动,生产是生产者的私事,具有私密性。而作为社会产品,它又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披上神秘的面纱。货币拜物教就是在私有制下商品生产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矛盾在商品货币交换中的反映,它使货币显现出“魔法妖术”般的神秘色彩。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都迷惑不解,只有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才揭示了这一“奥秘”。

货币拜物教思想早在中西古代的封建社会时期便已经存在,而在中国出现得更早。由于西方在封建社会时期,经济受战乱等影响较为严重,经济发展远落后于中国,因此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数量要远超西方,出现的时间也早得多,并且表现形式更为丰富。早在中国东晋王朝(公元317年-402年)就出现了鲁褒的《钱神论》,其曰:“钱之为体……为世神宝……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

①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第六十四)·策林三·议百司食利钱》,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39页。

② 《唐会要(卷九十三)·诸司诸色本钱上(元和十一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75-1679页。

③ 陈亮:《陈亮集·普明寺长生谷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0页。

④ 康熙年间规定每年5两当铺税,当时每年可收十一万多两,以此推算二万多家。

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死生无命,富贵在钱”^①。实际上,在鲁褒之前一百年,就已经出现一篇内容较为简单的钱伸论,这说明在中国两晋时期,那时的货币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货币的流行已完全成为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更为迷惑人的眼睛”的东西^②。

但是,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传统中,是不认可“钱能通神”的货币拜物教思想的。虽然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工具和批判武器,但却从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对货币的社会功能有了新的认识。《钱本草》是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张说仿古传《神农本草经》体式与语调创作的一篇散文。它归纳了金钱对于经济、民生、社会、人性等方面具有的正负影响和作用,主张以儒家的道德精神力量来驾驭金钱,提倡对金钱要取之有道,取用适度,积散有序,造福民众。全文语句精炼,内容新奇,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适度用钱则可治病,违常用钱则可害人的道理。《钱本草》分析货币的利弊:“钱,……,善疗饥,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能召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提出以德、义、礼、仁、信、智来克服货币可能对产生的不利影响^③。这可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货币拜物教的最早揭露和批判。

二、中国近代金融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金融实践

中国近代的金融转型既与社会性质的变化相联系,也与西方金融思想和理论的传播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各国纷纷在华设立银行进行经济侵略。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后改称东方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是最早在华设立的外国银行,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止,英、法、德、日四国在香港地区 and 上海设立的银行达到十四家^④。这些银行的设立都是非法的,它们在中国营业,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对此,1904年的《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会报告》也不讳言。它们大都在中国发行钞票,这些钞票分为两类,一类用中国的货币单位,一类用外国的货币单位。用中国的货币单位分为银元券和银两券。这些银行不仅运营中国政府的赔款和借款,还开展对华投资业务,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和贸易结算。1897年中国人设立了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4年清政府也成立了户部银行,即国家银行。在清朝覆灭前,先后设立的商业银行还有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交通银行以及由一些省的官银号(官钱局)改组的地方银行。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业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之初,新设立银行更多。仅1920和1921两年,全国新设银行达50多家。总的看,旧中国金融业向现代的转型受三种势力支配:一是外国银行,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二是旧式钱庄,代表封建势力;三是新式的中国人银行,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势力。

(一)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传播及其对传统知识体系的影响

对外国金融认识最早的一批人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本土知识分子。1846年,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英国为例,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银行学知识。该书比较简单地介绍了英格兰银行及普通商业银行的设立以及开展的银行业务,其中把英文Bank译作“银局”,没有使用银行一词。郑观应1894年的《盛世危言》使用了“银行”一词,设有银行专栏,并附录了《英国国家总银行考》,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银行的组织形式、职能、作用、资金来源、业务、收益、以及银行券的发行等近代银行业务知识。1896年,容闳翻译了美国1857年制订的《国家银行法》,企图说服清政府设立国家银

① 严均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113),黄冈王氏,1894年版,第210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页。

③ 《钱本草》,《全唐书》(卷二百二十六),《张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81页。

④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2页。

行。1897年,由傅兰雅口译,徐家宝笔录的英国人布来德的货币银行学著作,以《保富述要》为书名出版。这是第一部汉译货币银行学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英国银行的法律、规章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开展业务中的风险和防治办法^①。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问答读者来函提问时提出:“金融者,指金银行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②。这一解答虽不准确,但他是第一个把货币信用业务称为“金融”的中国人。辛亥革命前,梁启超为挽救清朝末年的经济金融危局,开始研究中国货币史,考证中国古代的币材,试图设计政府的财政改革方案。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币制、银行制度、纸币发行与金融政策等,提出了以金融为核心,经济、财政、金融一体化的改革建议,呼吁改革货币体制,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整顿赋税、举办和利用公债及改革财政制度。1914年他担任熊希龄内阁的造币局总裁,在其主导下,铸造发行了十几亿枚银元,各种劣币被驱逐,统一了货币。1917年他又当上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但他对段祺瑞利用其声望筹措军费不满,四个月后就黯然离职。

最早由国人编撰的货币银行学著作是留日学生谢霖、李激于1911年4月出版的《银行制度论》,该书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论著,基本以日本的银行体系为模板,详细介绍了现代银行体制、机构和运行。辛亥革命后,介绍和研究西方银行和金融的理论书籍不断增加,且内容比之前更全面和准确。首先,清末出版的银行金融著作,主要强调其具有融通工商业资金和维持财政两大作用。辛亥革命后出版的著作则深入认识金融具有增益资本、节省货币流通、促进人民储蓄、促进工商业发展四大作用。其次,对金融机构的介绍更多了,包括了对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票据交换所、信用调查部等银行辅助机构的介绍。再次,更加详细深入介绍了英、日、法、德、美等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及其控制金融的作用及手段。这个时期的理论均反对采用国有制。主张中央银行应实行股份制。

1927年以后,介绍和研究西方银行金融理论的书籍进一步增多。据统计,1927-1949年间,共出版了42部银行学著作,比北洋政府时期多了24部。其中译著15部。国人自撰的27部。从1939年开始有学者翻译出版苏联的银行理论。如万鸿开翻译哈巴德著的《苏联之货币与金融》(1939);吴清友编撰了《苏联的货币与银行》(1949);彭华翻译了阿特拉斯著的《苏联银行国有史的发展》等。这些著作对苏联银行国有化理论及银行国有化发展的历史,以及苏联银行的组织及立法、苏联的国家银行及各种专业银行制度及业务都做了详细介绍。此外,我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国情,开始自撰中国的银行金融著作,其中有孙祖荫1929年出版的《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梁钊文1931年出版的《中央银行制度概论》,陈天表1934年出版的《中央银行之理论与实务》等。

与西方银行金融理论相比较,中国传统金融思想领先于西方认知的方面是货币、价格与信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货币的起源、币材、货币的性质与职能、货币铸造权、货币本位制、纸币的发行与管理、商品价格的调节与稳定、政府信贷与私人高利贷等,形成了比较深刻的思想,如《管子》的货币数量说、贾谊关于货币铸造权必须集中与统一的思想、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思想、南宋与元初的纸币发行与管理思想等等。这些思想都早于西方千百年。但是,中国的金融思想不探讨信用机构的职能与作用,即使在票号与钱庄产生以后依然如此。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局限性,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落后的。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加上西方银行金融理论传入,关于银行信用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银行的监督管理、银行与财政的关系、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等问题,成为中

① 程霖:《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新民丛报》,1902年第三号,第103页。

国金融思想界研究的主要内容,使中国金融思想发生重大转型。特别当银行理论融入中国金融思想的研究后,中国金融思想发生了移植性变迁。

金融思想和理论的变化促使金融学在经济学中形成独立的分支学科。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价格、信用等问题的分析是同其他经济思想,以及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内容融合在一起的,研究的目标导向是货币、信用等问题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伦理的关系,及其功能与意义。如同经济学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丰富但又不系统的金融思想也自然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金融思想的转型推动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运用西方的货币理论和银行理论,研究中国的银行金融制度建设、币制改革、货币政策等问题,撰写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既有对西方货币银行学理论的介绍与评价,也有对中国银行金融制度建设、币制改革等金融问题的理论探索,从而初步构建起中国金融学的理论体系,并为银行货币学作为重要课程在许多大学开设创造了条件。早在1902年(光绪28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即规定,仕学馆第三年学“银行、保险、统计学”^①。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把大学分为8科,在商科中的银行保险学,把银行业要义、银行论、货币论等列为主课^②。中国金融思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国民教育中教学体系的初步构建,促进了金融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

(二)近代货币金融思想对中国金融体系转型的影响

在中国金融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金融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各类新式银行不断设立,社会各界和北洋政府也开始探讨中国的整个银行体制建设问题。思想倾向日本的周学熙于1912年率先提出以日本为榜样,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基础,专业银行为辅助的多元化银行体制^③。康有为的看法与周不同,他在1913年发表了《理财救国论》,提出吸收和融合欧、美、加、日银行体系的不同特点,形成一个综合型的银行体制。梁启超也不同意走日本路线,他在1914年发表了《银行制度之建设》,提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制与美国国民银行制并存的混合型银行体制^④。以上三种构想是北洋政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潮。毫无疑问,亲日的北洋政府自然亲睐周学熙的主张,因此也对这个时期中国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产生了实际影响。1913年4月北洋政府仿照《日本银行法》颁布了《中国银行则例》,并成立中国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模仿《日本银行法》规颁布了一系列银行条例,从银行条例的制定及其内容来看,北洋政府是想仿照日本银行制度模式,建立中国的银行体制^⑤。从实际操作的结果来看,在1927年之前,中国所设立的银行种类,既有具有中央银行性质和国有银行性质的中、交两行;又有以“南三行”、“北四行”为代表的,私人资本设立的众多的商业银行;同时还有以官办为主,吸收民间商股的农工银行、殖业银行、盐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棉业银行等各类专业银行。总之,这个时期,无论从金融理论与政策思路,还是北洋政府的实践操作来看,中国银行体系基本是仿照日本模式建立和发展的。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九个根据地先后建立了57家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发行纸币、银币、铜币等信用工具共217种^⑥。特别是1931年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已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同年11月7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在性质上属于“国营事业”,并于1932年3月正式营业。其功能是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① 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179页。

② 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179页。

③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64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56页。

⑤ 周葆蓁:《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沧水:《从法规上以观察吾国之银行制度》,《银行周报》第4卷第26号。

⑥ 刘鸿儒:《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各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的工农银行都归并于国家银行。1937年国家银行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地主封建势力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此革命根据地金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支援武装斗争。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制订了总方针:“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①。在革命政权还不稳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苏区纸币的信用,根据地的银行都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基金,主要是群众集股和政府军队的拨款。在银行吸收的存款中,主要有财政存款、没收剥削阶级和征发的款项(大约占40%~50%),其次是军队和人民的捐献、个人储蓄;以及生产贸易活动的各项税收。纸币代替黄金作为价值符号,依据国家权力强制而流通,考虑到根据地政权信用刚刚建立,以及人民群众对贵金属的传统心理,苏区纸币既要保持发行数量的合理性,还要照顾群众对银元信赖的认知,因此苏区银行都备有充分的银元,保证纸币随时兑现。因此苏区币值稳定,1932年苏区刊物《斗争报》第66期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而且兑现充足。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也报道过苏区货币稳定^②。这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事例。

根据地的银行业务充分贯彻了毛泽东制订的金融方针,首先是支持经济发展。发放贷款主要是:对合作社发放无息贷款;农业生产贷款;支援粮食调剂局贷款,目的是调剂米价,提高贫苦农民购买力,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包括对苏区以外地区贸易的贷款。这些贷款都遵守严格的利息标准,不允许放高利贷。苏区银行也对政府提供垫款,即财政透支,但数量不大,这在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是代理国库、代理收税和代理发行公债。再次是开展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金融斗争。支持贸易机构输入苏区需要的盐、布、煤等工业品;并收购掌握可以输出的米、纸、木材、钨砂等初级产品,同时,严格禁止现金(贵金属)流出,颁布了《现金出口登记条例》,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些措施与《管子》轻重理论中的对敌国的轻重之术的斗争方法颇为相似。最后是领导信用合作社,实行低利借贷,消灭高利贷盘剥。苏区广泛实行了废债运动,让广大农民从地主、富商的高利贷重压下解脱出来。实现了古代先哲呼吁消灭高利贷的千年愿望。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曾一度废除苏币,使用法币,由于缺乏辅币,曾发行低面额的辅币,并可随时兑换法币。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对边区封锁,为了打破封锁,1942年2月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规定与法币的兑换率是1:1。1944年边区政府决定发行“流通券”,1945年6月1日起,“流通券”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本位币,边币退出流通。1942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③。金融工作是整个财经工作的重要环节,这个方针要求金融工作通过货币发行,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活跃经济,以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生活费和革命事业的经费来源。为此,根据地大力向农业和农户发放贷款,1942年延安县通过农业贷款,增开荒地十万余亩,可增产粮食二万六千余担。此外,还贷款扶持工业生产。1944年各种公营厂矿发展到一百多个,工人一万二千余人。同时,实行稳定通货的方针。首先要控制发行数量,保持合理的货币需求量;其次是根据通货区的扩大和缩小,以灵活掌握货币增发和回笼,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变化掌握货币数量。再次是要掌握一定数量的重要物资(主要是粮食和棉布)。这与《管子》说的,谷物民之司命、黄金民之通施是一个道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实行独立自主和独占的货币发行,并开展维护根据地货币的金融斗争。虽然曾规定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但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所以各根据地都先后禁止法币流通,其他一切土杂币、伪币以及各种金属货币,都不准自由流通,一律实行根据地的“本币一元化”流通。为此开展了独占货币区的金融斗争,排斥法币和敌伪货币,扩大本币流通,以使人民免遭法币和敌伪货币贬值的损害。在抗日游击区,采取压缩敌伪币市场,扩大本币市场,将其演变为混合市场,进而成为本币市场。其次,开展比价斗争,正确确定或变动敌伪与我两种货币的兑换率,以利于货物在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出口和进口,争取对我有利。这就是《管子》说的要“因”天下之轻或“乘”天下之重,以达到控制天下的目的。再次,开展反假币斗争。由于印刷技术水平低,敌伪乘机制造大量假币破坏根据地经济,根据地广泛建立“假币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并大力宣传反假币。终于使敌伪破坏根据地的阴谋破产,根据地货币稳定,信誉不断提高,为新中国人民币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事业继承革命根据地时代的光荣传统,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金融发展道路,同时不断与时俱进,改革与金融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不断探索迈向金融强国的发展道路,成功地描绘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事业发展的壮丽画卷。粗略划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时期

这个时期,党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金融思想和理论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坚持独立自主,确保新中国金融事业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走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都相继成立了公有银行,发行各解放区的货币,1948年党中央决定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中国人民银行遂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并发行统一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逐步把各解放区银行改组为分支机构,并在新解放区设立分支机构。基本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同时开展了以人民币收兑各解放区旧币的工作,很快统一了全国解放区的币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敌的货币斗争。这包括肃清金圆券,开始采取驱逐为主、收兑为辅的方针,到上海解放时,采取迅速、全面、无差价的收兑方针,此后金圆券很快被完全肃清。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解放前夕,美元和港币的流通量相当大,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币收兑并实行外汇管理使用,还严禁金银计价流通和私自买卖。确保人民币的本币主体地位和金融市场稳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经济纲领”和中共中央的决定,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正式确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在解放前,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中央金库为主体,构成了旧中国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此外还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保险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解放前,外商在华金融机构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工具,新中国建立后,取消了外商金融机构在华特权,但允许其合法经营。由于特权被取消,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多数外商银行申请歇业,人民政府制订了“彻底清理,全部保值偿还中国人民的债务”的停业清理方针。1952年以后,在华继续开业的只有设立在上海的汇丰、渣打(麦加利)两家英商银行,外商保险机构情况与此相似^①。此外,还加强了对私营银钱业的整顿和管理,采取发挥其有利于促进工商业发展

^① 吴承明、董志凯(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777-778页。

的有利一面,但限制其投机经营、信用膨胀的不利一面的方针政策。划定它们的业务范围,淘汰资信差、投机性大的行庄。所收存款规定缴存保证准备金和备付准备金。对存放款利率实施干预政策等。有效保障了劳动人民利益。

其次,人民币稳定的最根本基础是国家主权信用及其物质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就明确宣布:人民币为不与金银等贵金属兑换的纸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主要依靠国家信用和物质保障。1949年5月27日,在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解放后,其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就经历了“银元之战”和“两白一黑之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彻底击跨了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的各大投机商,使上海真正获得了新生。上海人民政府成立后,针对投机商炒作银元,致使银元价格猛涨、各类物价随之高企、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严峻形势,人民政府首先采取了经济手段,通过增加银元供给的方法来使银元降价。6月5日,投放了10万枚银元,第二天又追加了31万枚,但收效甚微。这说明经典的所谓纸币发行以贵金属为准备和保值的理论并非可靠。纸币信用的根本基础是国家信用,这个信用来源于国家的决策能力、强大的资源动员和治理能力。果断地打击金融违法投机商的法治手段,再加上从全国各地筹集调运物质的强大能力和精细管理,不仅保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且摧毁了投机商人的经济实力。即便在刚刚解放的、一穷二白的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就能战胜敌对势力的经济进攻,这不是西方金融教科书所能解释的,这只有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才能解释得通。

再次,正确对待私营金融业,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在新中国的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有关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书面报告形成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其基本要点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集中统一财经金融工作,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策略,致力于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从而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建设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此期间,我国的金融事业与解放前的体制相比,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以剥削为生、以投机为主的畸形金融业态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以稳定物价和繁荣市场、发展经济为目标的新金融体系,这个新体系以与政治、经济互动为基础,在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如调整公私关系、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等等,都创造性发挥了金融的功能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处理好公私关系十分重要,关乎全国经济之兴衰。1950年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次谈到有关改善公私关系问题,阐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以团结为主,节制资本但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的政策^①。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理念,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渊源。同时,党也没有忽视同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做斗争,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整顿与改造金融业。通过运动,非法的金融投机遭到了严重打击。在这次运动中,价格灵敏的金融商品如黄金、美钞、港币、证券和拆放息,均大幅降低,甚至出现没有行市的情况。各地居民普遍到国家银行兑换金银。非法金融投机、金银黑市销声匿迹,金银外币大量兑入。银行信用业务方面,国家银行的存款稳步上升,定期储蓄、货币储蓄比例日增,私营金融业的存放款业务逐步下降。金融市场空前安定,对巩固人民币、健全货币流通,发展正常的银行信用,降低利率,更多的集中资金,扶持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也是针对旧金融业“投机性”和“虚拟性”倾向的第一次坚持“以义取利”“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的思想教育。

最后,探索了财政、信贷、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综合平衡的经济运行规律。新中国前30年的经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济建设,由于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金融信贷平衡离不开与之密切相关的财政、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之间的综合平衡关系,得出这样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是中国独创的金融思想理论的创新。在这四者关系中,基本建设是主要矛盾,如果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就会出现“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结果,形成物资供应紧张,物价波动局面。相对于金融信贷,财政平衡是主要矛盾,因此既要坚持当年财政平衡,也要稳慎动用上年财政节余,因为这不仅涉及资金平衡,还涉及物资供应平衡,只有统筹财政、信贷和物资供应三者,才能扩大财政支出。信贷收支平衡要坚持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相适应,而且要考虑信贷结构中工业与农业的不同特点对于商品流通的影响。工业部门的贷款,可以使银行掌握回笼货币的物质基础;但是,农业贷款将主要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因此银行在安排农业贷款时,要结合商品供应(农业生产资料)进行统一平衡。

(二)改革开放前35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这个时期,党在金融制度以及思想理论认识上的主要创新如下。

首先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银行体系。邓小平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①。邓小平说的真正办成银行,就是指使银行成为独立的机构,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势在必行。1978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与商业经营脱钩是改革的必要步骤。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设立工、农、中、建四大行为经营性的专业银行。1995年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推进了多层次银行系统的构建。1987年,国家对专业银行实行了“三率”核定,下放六项自主权,让其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原则从事经营运作。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在《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构建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架构;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在迈开金融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之后,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规范了金融业务行为和秩序,保障了商业银行的权利和义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其次是金融调控机制的转变和多元化信用体系的建立。金融调控机制的转变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行政性的数量控制是货币供应量调节的手段。1998年以后,金融调控机制逐渐转向间接的数量型控制与资金价格控制手段相结合的轨道。在货币供应量调控中,间接的数量型控制有对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资金价格的调控手段则是不断使利率走向市场化。2002年9月以后,又引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债券手段,即通过中央银行票据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

发展多元化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实现多元化金融市场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环节。在邓小平支持下,1979年7月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随后全面恢复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80年代初,随着发行国债的恢复,成立了专门承销和交易国债的证券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成立了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

再次是推进金融开放。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金融开放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允许其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不断扩大其业务经营地域,减少客户对象的限制,对其实行国民待遇。二是对大型中资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在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境内和香港地区发股上市。三是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迈开国际化的步伐。四是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构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五是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

最后是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机制。这包括不断完善金融业务的法律和法规,建立和完善金融业的监管机构和组织框架,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组织体系。各监管机构针对本领域金融业务制订工作机制、流程和技术标准,开展数据和信息分析,实行依法依规监管。在处置不良贷款率和防范海外金融危机冲击中,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金融监管体系在我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和金融市场迅速扩张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保障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了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显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和法治化水平。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明确了金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金融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充分运用党在理论创新上采取“两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首先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内涵、擘画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实施路径。习近平强调,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是金融强国的基础,同时还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也必须以金融强国作为重要支撑,这是古代先贤“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思想在今天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结了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内涵包括: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分工协作和协调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适合中国经济特点的专业性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和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以及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习近平还指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要内容,金融治理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中国特色金融要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义利兼顾”“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金融工作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筹考虑金融机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寻找发展空间,寻找自身利益和社会福祉的结合点。当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努力开拓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的新领域、新赛道,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经之路,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

其次是明确了体现国家经济主权和行使国家经济职能是金融政治性的深刻内涵。马克思指出,捐税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并揭露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①。因此,国家除了是一个维护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之外,还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的行政机构,尤其它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经济载体,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②。为了保护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不仅需要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暴力工具,还需要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载体。愈是社会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载体就愈发达,其功能也就愈重要。

经济主权是金融作为国家经济属性的首要标志。其主要功能是发行和管理货币。发行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9页。

是国家用以规定社会财富符号的经济权利,是经济主权对国家信用工具的赋能。即创造国家信用。新生的人民政权,它直接发行货币的最重要基础就是国家经济主权所体现的国家信用。中国共产党具有长期的金融实践,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时,新华社就宣告“解放区的货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即与金银脱离关系”^①。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金融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②。同时,人民币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的流通规律对人民币进行管理,货币发行的目的主要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不是弥补财政支出,这是人民币之所以能够依靠国家主权信用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货币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文明基因的在新生代的创新发展。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信用成为跨国界的信用产物。西方国家主权货币依次成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西方金融工具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元霸权,使美国主权信用泛国际化。但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演变,国家主权信用国际化也呈现多样化;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人民币崭露头角,中国的主权信用也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不仅表明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反映出金融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行使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目的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满足各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它必须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各种经济、社会政策保持宏观取向的一致性,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还必须注意在经济的不同周期实施货币政策的适时调节,才能灵活应对经济波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金融支持公共工程建设,发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行使国家经济职能另一个表现。这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它干预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通过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的方式募集资金是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金融在服务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开放举措上,都发挥重大作用。通过实施差别化利率,是金融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辅助手段,也是金融行使国家经济职能又一个表现。利率是资金价格,对不同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提供不同成本的资金供应,既反映国家经济调控的目标取向,也间接影响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是共同富裕目标导向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工具。正是由于金融的上述内在客观因素,金融制度与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性制度。

再次是明确了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是金融人民性的基本内涵。金融的人民性是由金融的本源决定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有社会经济现象都是建立在人民劳动创造的基础上。马克思《资本论》指出所有金融活动的基础都是人类劳动。工业大机器生产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国民储蓄和银行资本的转化形态,这是金融的本源。借贷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货币资本倘若不经过生产过程的使用,并不能真正地自行增殖自己的价值。生产过程是资本定律的基础。而资本定律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范畴的基本逻辑。现代社会的金融运行必然受资本运动规律所支配。金融的本源决定了社会主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其内在的要求。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而言,金融体系永远是从属性的,它来源于以生产过程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发展壮大自己,这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发展方向。实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③。在经济活动中,纯粹的金融产品交易和

① 吴念鲁、陈全庚:《人民币汇率研究》(修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炒作房地产等虚拟经济活动,只能使少数人获利,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就业并享受发展成果。当前,改善住房条件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迫切要求。金融主动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重大转型,为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这与古代先贤关于“民之通施”“博施救众”等货币与民生关系的思想都是相通的。

最后是进一步强调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它充分证明这是我国金融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在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2024年1月16日的讲话中,习近平总结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①。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具有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它既是党的百年实践传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传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来看,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发展起决定的反作用。列宁的著名论断是:“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都论述过讲政治的重要性及其时代内涵,而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讲政治的突出体现。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其中重要的理论范畴。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学派,要么把市场与政府看作绝对对立,要么把政府与市场看作平行而对立;在实践中,在西方多党轮流执政和虚假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始终是两张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起来的重大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破解了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

四、结 语

建设金融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目标,它在《管子》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书中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②,即大国强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金融基础;同时还通过揭示商品与货币价格关系运动的规律,论证了货币与商品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中国最早的思想源头。古代思想家强调由最高统治者掌控贵金属采掘和冶炼,掌控货币发行,这也是对金融体现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金融的国家经济属性的最早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及金融工作必须“以义取利”等重大理论观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下中华文明基因在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古代金融文明思想的传承与发扬,只有在“两个结合”产生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强国才能迈开坚实的步伐。

参考文献:

-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白居易(唐):《议百司食利钱》,载于《策林三》,收于《白居易集》(卷第六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月17日。

② 《管子》,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59页。

-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 陈亮(南宋):《普明寺长生谷记》,载于《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 程霖(2005):《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 戴金珊(1998):《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
- 范晔(南朝宋):《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 郭田勇(2018):《再回首、再思考、再出发——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洪亮吉(清):《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
- 胡寄窗(1981):《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贾士毅(1917):《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 黎翔凤(2004):《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 李焘(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
- 梁启超(清、民国):《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
- 刘鸿儒(1980):《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刘锦藻(200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四),钱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
- 马克思(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桑弘羊(西汉):《盐铁论校注·错币》,中华书局,1992年版。
- 尚明(1989):《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石毓符(1984):《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司马迁(西汉):《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 斯诺(2010):《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
- 孙希旦(1989):《礼记集解》,中华书局。
- 孙诒让(2001):《墨子间诂》,中华书局。
- 脱脱、阿鲁图(元):《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 王茂荫(清):《王侍郎奏议》(卷一),条议钞法折,黄山书社,1991年版。
- 王溥(宋):《诸司诸色本钱上》(元和十一年八月条),载于《唐会要》(卷九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
- 吴承明、董志凯(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吴念鲁、陈全庚(2002):《人民币汇率研究》(修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
- 吴晓求(2019):《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 萧子显(南朝梁):《南齐书·刘峻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 徐沧水(1920):《从法规上以观察吾国之银行制度》,《银行周报》,第4卷第26号。
- 徐元诰(2002):《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 严均可(清):《全晋文》,收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894年版。
- 约翰·洛克(英)(1691):《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 张说(唐):《钱本草》,收于《全唐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 赵靖(1998):《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 周葆蓁(1920):《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
- 朱熹(南宋):《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周莉萍)(编校:周莉萍)

Chinese Cultural Lineag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Power Concept

PEI Changhong^[a]

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was among 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s to utilize and comprehend currency. Through prolonged financial practices, it developed a splendid tradition of ancient financial thought that constitut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ineage for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primaril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cy and wealth, its connection with state power, the functions and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currency, credit and lending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monetary fetishism and its critique. Thes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emerged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years earlier than in the West. With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al forces in modern history, China's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underwent transformation towards modernity, accompanied by transplanted changes in financial thought. However, owing to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emerged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ory, which preserved the independence and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e financial practi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prolonged exploration i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forged a successful path integrat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a's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maintaining continuity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as created essential preconditions and foundations for building a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China as a financial powerhouse.

Keywords: Financial Powerhouse; “Two Integrations”;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JEL Codes: B11; B24; N25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and Industry-Level Analyses

LI Xichen^[a] ZHANG Ming^[b] LI Xingshen^[a]

a.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b.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a dual-dimensional analysis at both country and industry levels, with a focus on the mechanisms of capital deepening and labour substitution by capital. Using panel data from 140 countries between 1981 and 2021, we find that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s income inequality, as measured by the Gini coefficient, with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s explaining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 in this effect. At the industry level, analysis of sectoral data from 29 economies between 1995 and 2021 reveals that liberalization reduces labour income shares in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particularly those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low-skilled workers—while increasing labour income shares in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Mechanistic evidence highlights two distinct pathways. First, in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liberalization triggers a pronounced decline in capital prices, driving capital stock accumulation and output expansion, which temporarily attracts labour inflows but ultimately consolidates sectoral dominance. Second, in industries with high labour costs, liberalization accelerates the substitution of labour with industrial robots, fundamentally altering capital-labour substitution dynamics. These findings underscore how sector-specific factor mo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medi-